



反腐不能等着下一个小三翻脸

风起于青萍之末,官倒在石榴裙下。

根据罗昌平的说法,他“曾接到刘铁男情妇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,获得重要的初始信息”。不出意料的话,刘铁男的官场不幸,应该从这个电话开始。

很多怀疑论者依然坚持认为,刘铁男的落马,不是缘自网络反腐,而是权术斗争。中国官场每倒下一个官员,他们都这么认为。但他们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,这些年来,无论是陈希

同、薄熙来、陈同海,还是最近的衣俊卿、刘铁男、雷政富等等,他们倒下的地方,都铺着一块甚至几块石榴裙。

刘铁男与情妇徐姓女人,相是在日本结识的。一个当经济参赞,一个读博士并兼职翻译。刘铁男曾亲自出面为这位红颜知己介绍工作,终因“利益关系反目”,当年的小情人,成了刘铁男恨之入骨的祸水。

权力是最好的春药。压在赵红霞、常艳们身上的,与其说

是男人,不如说是权力。是嫖客与娼妓的一种交易过程。他们中没有一个好意思往爱情里扯,还不如那个被女人拍了裸照发到网上的村干部,在他被举报之后,直接向女人求婚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性的卑劣程度,有时候越往职级高的位置走,越下流得不动声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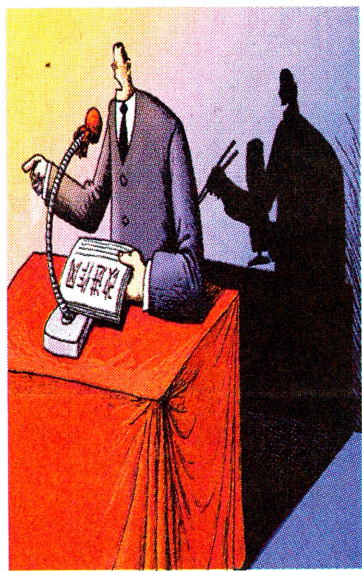
重庆那18个与雷政富一样,利用权力同睡了赵红霞的官员,最后以“严重违法社会道德”“分别给个处分就完事了。意

思是一时贞洁不保,睡了别的女人。按这个理论,官员与小三,哪个不是权力交易的娼娼过程?哪个发泄完后不是用老百姓的纳税钱在埋单?身体上心理上享受完权力的刺激,到头来还享受普通人民群众的自由标准,这是权力表现出来的流氓相。养了小小三嫖娼,一句领导干部也是人,就把自己等同于老百姓了。你让领导干部晒家底,一句公民享受同等隐私,就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队伍了。

中国式权力性欲强,不是因为诱惑多,而是这个权力的舞台太百无禁忌。你一登上舞台,就像躺到了春梦连连的床上。

从隔墙扔砖,到等待下一个小小三翻脸,民众反腐靠的是运气。没有如坐针毡的有效的制度监管,权力就会永远是春床。哪怕今天贪食如仇的民众躺上去,也会是下一个刘铁男。权力的催情效果,不在人的区别,也不在觉悟的区别,而在于制度的约束差异。

□刘雪松



改作风

一些地方在改作风中,依然存在言行不一、只说不做等现象。比如,少数干部会上表态言辞恳切,会后却大搞高档消费;有的单位出台文件承诺落实,但依然“门难进、事难办”;还有一些人虽然下了基层,却是“隔窗看景、走马观花”,不能融入群众。

这正是:人前唱廉人后奢,明里抓紧暗地松。光说不练假把式,路石留印真作风。

□李宏宇 三 宝

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说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中国的士大夫们没几个人能靠自我约束做到,然而美国的公务员们却靠相对完善的工资制度践行了这句话。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,公务员的工资标准以私企为参照,公务员的工资必须涨在老百姓之后,先涨百姓工资,后涨公务员工资,而且公务员工资的涨幅永远低于百姓。美国公务员的工资标准由国会制定,所以,很少有人对公务员工资不满。

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建立,实质上还是由市场决定的,

从美国政府每年招募公务员的情况看,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。美国联邦审计总署曾在几所大学进行调查,发现学生们几乎都对公务员职位没什么兴趣。在64个被调查的学生中,只有两个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应聘公务员。

一份2008年的数据显示,美国公务员当年的封顶工资是191300美元,而这一年外科医生的工资是206770美元;公务员的最低年薪是17046美元。而一个餐馆端盘子的工资就有17400美元。这表明,美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低于私企。

地,电子技工的工资要比当地私企同类工种的职工每小时低5美元。

美国刚建国时,就通过了一条法律:“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,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,均不得生效。”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利益回避制度,谁提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,要等到他的下任才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。这就阻止了官员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岗位上不好好为人民服务,天天琢磨给自己加薪的不道德现象的发生。

美国总统即使再有权力,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、给自己

工资每年有个年度微调,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人工资成本指数;但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.5个百分点。法律还特别规定,只有总统有权对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,但必须报国会批准。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: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平。

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: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,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1级工资标准,该工资不得支付。此外,公务员与私



为什么公务员在美国不抢手?

各种有关工资的法律制度是根据市场变化产生的。美国总统、州长、议员等公务员职务还有人去干,这说明他们接受那样的职位标准,因为没人强迫他们去当公务员,所以,现实中几乎听不到公务员抱怨自己的工资低。

2005年,美国针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查,调查结果是:大多数公务员认为政府的待遇最差,在由私企转入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中,32%的人认为工资比以前低,35%的人认为与以前持平,只有33%的人认为比以前高。

由于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,私企工资增幅大,公务员工资增幅小,这就使公务员工资与私企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。1990年,私企的工资比上一年涨了6.4%,而政府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只有3.6%,每年都是公务员工资的涨幅低于私企。

该报告通过对全国60个大城市的数据分析,得出的结论是:私企在90%的时间里工资要比公务员高,有时甚至高出一倍多,平均高出10%左右。在波士顿,联邦政府的飞机机械师的工资比私企校车司机低很多。在阿拉米达空军基

加薪的权利,总统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。比如,1995年11月,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,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,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一个星期。当时正值圣诞节,克林顿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支付白宫的电费,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。

美国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,是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《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》,以私企为参照的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就是该法案规定的。由于通货膨胀,公务员

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。美国各州公务员工资与联邦政府基本一致。州长的平均工资是124398美元,最低的缅因州是70000美元,最高的加利福尼亚州是206500美元。不过,有好几个州的州长分文不取或象征性领取1美元的工资,如加州州长施瓦辛格、纽约州州长埃里奥特、田纳西州州长布萊德森、新泽西州州长考兹尼等。堂堂第一超级大国的公务员,待遇不过如此。难怪美国公务员的招聘考试现场,没有出现过挤得水泄不通的场面。

□王猛



农民工『临时夫妻』提醒城镇化之路

中国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。然而他们很难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、就医、社保,正常的生理需求普遍不能满足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他们只能选择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家中。有“临时夫妻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们住在一起谈不上感情,只是一起搭伙过日子罢了。

农民工临时夫妻,是部分农民工的情感生活处在一种混乱状态的表征。或因情感走在一起,或因生理需求而结为临时夫妻,甚至可能是图一时的快活而已。但面对现实,这种生存状态的背后纠葛重重,冲突不少:双方情感的归属问题,双方家庭稳定问题,性病传播,以及因情感破裂而带来的伤害等。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存在,更多的是无奈。

这些年,对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待遇是有所改善,有些企业为农民工提供夫妻房等,确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,但农民工临时夫妻背后牵涉着庞大的社会工程。

首先要考虑的是,地方的产业布局。一个地方的企业用工,男工与女工的比例应趋于合理,不可过于偏向一方。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工夫妻双方都有就业的机会。同时,还应考虑地区发展的平衡。

其次,是要让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定居。一要考虑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。现在的农民工频繁跳槽,让职业稳定性大打折扣。同时,农民工的定居,还面临着买房的现实难题。

再者是,农民工工作生活区的城市配套功能要完善。农民工多数生活在城郊的工业区或工地,这些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,无法满足大批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入学、医疗等综合服务。要让农民工安定下来,必须让农民工的生活便利起来。

城镇化,应是人的城镇化。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无奈,提醒了我们城镇化建设之路须考虑农民工落地生根,让其成长为市民。当然,面对现状,切不可少了一些人性化的关怀安抚与引导。

□郁桦

DUSHU

读

书



1933年的中国

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,国难当头,这年元旦,胡愈之在《东方杂志》推出“新年的梦想”,一下子发表了142位知识分子的250个“梦想”。此前,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:

在这昏黑的年头,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,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,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。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……我们诅咒今日,我们却还有明日。假如明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,在这漫长的冬夜里,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个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。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!

什么也不相信的鲁迅没有参与“做梦”,他知道胡愈之的用意无非是“以为言论不自由,不如来说梦,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,不如来说梦中之真”。他在元旦当天写的《听说梦》中说:“虽然梦‘大家有饭吃’者有人,梦‘无产阶级社会’者有人,梦‘大同世界’者有人,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,白色恐怖,轰炸,虐杀,鼻子里灌辣椒水,电刑……倘若不梦见这些,好社会是不会来的,无论怎么写得光明,终究是一个梦。”

在一个“昏黑的年头”,这么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“做梦”自然要闹祸,不久(3月16日)胡愈之就被商务印书馆辞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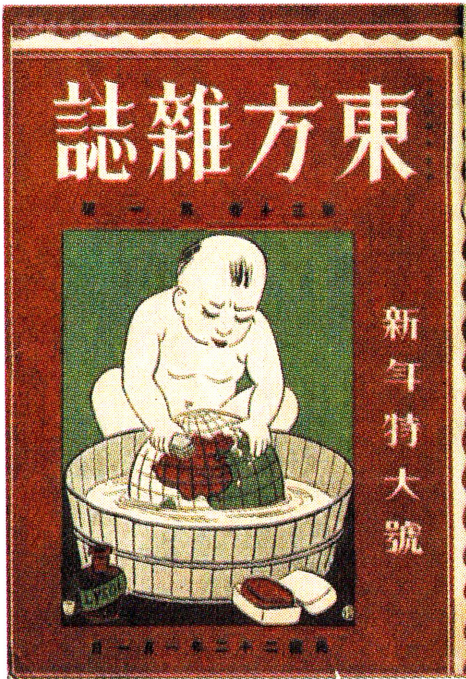
1月21日,年仅32岁的《江声日报》主笔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,罪名是“共党报纸”、“蓄意煽起阶级斗争,鼓动红色恐怖”等。《江声日报》编辑、撰稿人张醒愚、于在冤、余水痕等同时被判刑。镇江新闻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吁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,揭露真相,抨击暴政。2月1日,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五项决议,包括联合报界公会、律师公会、市商会、市教

育会等团体合力抗争、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。2月5日,首都(南京)新闻记者协会也发表宣言,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抗争。

刘煜生被处决几天后,上海《时事新报》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枪杀。2月17日,北平记者公会为刘煜生和王慰三举行追悼会,北平市外勤记者协进会就他们被害一事通电全国,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。

2月19日,上海各报239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,为刘煜生伸张正义,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“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,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,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。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,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”。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,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、草菅人命。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、惩办责任人。天津、武汉、杭州、广州、青岛、济南、郑州、徐州、芜湖、南昌、蚌埠、长沙、太原、汕头、香港等地到处集会,发表宣言、通电,谴责暴行,呼吁保障新闻自由。《申报》、《生活》周刊等报刊予以详细报道。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此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,蒋介石被迫将他调离江苏。8月和9月1日,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出《保障正当言论》、《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》的通告。在全国新闻界、人权组织、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声浪中,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终于作出了表面的让步。“9月1日”,这是刘煜生他们以鲜血换来的记者节,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。

4月,陈独秀“危害民国”



案开庭审理,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,不失“五四”当年的风采。和他一起办过《甲寅》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。尽管陈独秀最终以“文字为叛国之宣传”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,但当时的《申报》、《国闻周刊》、《法治周刊》等都详细、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,《益世报》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,乃至判决书、上诉状等。南京《中央日报》发表文章称:“章士钊律师之辩护,博得旁听,滔滔万言,作者既自炫其文采,读者亦亦相取为卓论;数日以来,南北论坛因章君之倡而为之倡和者,不一而足。”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主持的亚东图书馆重印了一千部《独秀文存》,蔡元培为《独秀文存》第九版作序,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“即到今日,仍没有失掉青年模样的资格”。而且,出版了陈案资料集《陈案书状汇录》,印了一千册,包括起诉书、陈独秀的自辩词、章士钊

的辩词、《中央日报》的社论、章士钊在《申报》回击《中央日报》的文章及判决书等,共102页,1933年5月印行,没有标明版权页,以致收藏者误为章士钊律师事务所所印。此书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、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的教材。

“我的态度是头可杀,而我的良心主张,我的言论自由,我的编辑主权,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。”这是《生活》周刊主编邹韬奋的话。6月18日,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,身为同盟执行委员之一的邹韬奋传说也被列入了黑名单,多处传闻《生活》周刊将被查封。7月14日,邹韬奋将编务交给胡愈之、艾寒松,“出国暂避”,开始了第一次流亡。12月16日,国民党当局以“言论反动,思想过激,毁谤党国”的罪名下令封闭《生活》。最后一期《生活》(总第417期)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《与读者诸君告别》,“宁为保全人格格而绝不作不义屈”。同时发表《生活》周刊同人《最后的几句话》:“统治者的利刃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,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。”

这一年因为推出“新年的梦想”,胡愈之被迫离开了《东方》;这一年,《江声日报》主笔刘煜生被残酷地枪杀了;这一年,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陈独秀因言获罪,被判刑13年;这一年,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;这一年,邹韬奋流亡异国,《生活》周刊被查封了;这一年,因为罗隆基锋芒毕露的社评,先是天津《益世报》遭遇国民党天津市党部、中宣部一再的“警

告”,后是罗隆基遭遇暗杀,幸免于难。年底,天津市党部向《益世报》下了“最后一次警告”,要求报馆不得续聘罗隆基,罗被迫离开《益世报》……这一年,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,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。

然而,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同样铁铸的事实。离《主张与批评》被封杀仅一个半月,这年2月,王造时又独自在上海办起了《自由言论》半月刊,毫无畏惧地继续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政外交,直到年底被查封,共出版了21期。6月6日,北平新闻记者公会举行集会,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新闻检查。这一年离柔石等“左联五烈士”被杀害已整整两年,“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”,鲁迅愤然写下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,《现代》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:“这篇文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,编辑先生不敢用,才转给我。”面对这枚“炸弹”,施蛰存也有点踌躇,“不敢决断”,“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。张读后沉吟不决,考虑了两三天,毅然决定:上!理由是一: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,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;二:经仔细研究,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,在租界里发表,顶不上什么大罪名”。重读这篇《纪念刘和珍君》前后辉映的文字,我们也不能忘记张静庐、施蛰存。

这是我们在1933年那个“昏黑的年头”所看到的亮色,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,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民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。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,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梦想。

□傅国涌

序文夸赞太过几乎是当下文化界的一大问题。这让让人想到中外知识共同体应具有的品质。

提起书序的话题,我觉得很惭愧,我才想到居然给别人给自己写过几十篇序文了。序文是一本书的开场白,跟现在新书发布会流行的“站台”差不多。当然,序文是书面的介绍,“站台”则是名流学者和作者一起面对面的跟读者聊天。

当代作家学者中,我知道钱理群先生是“写序专家”(摩罗语),钱先生写序是为“奖掖后进”,“把每一次邀约看作嘱托”。这种状态我很能理解,我给人写序也多半如此:不负所托,发潜德之光。但很多人以为现在的序不好看了,因为大多数书序作者爱夸张,只说好话,不说坏话。我就遇到一读者感慨说,看完一本民国史的书居然不如书前面我的序文给他留下的印象。

序文夸赞太过几乎是当下文化界的一大问题。这让人想到中外知识共同体应具有的品质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《地泉》写序,茅盾直言不讳:“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,要我写序,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他。”阳翰笙也大度:“批评也是好事。”茅盾推辞不得,只好动笔作序,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,或者竟失败的序,太过符号化。没想到阳翰笙竟把如此的尖锐的批评原文出版,茅盾连叹:“雅量,真是雅量。”

西方现代诗运动兴盛之时,庞德一度在诗界有“一言九鼎”之望。他帮过艾略特,曾大段大段地删后者的《荒原》,艾略特称他是“最卓越的匠人”。但庞德曾经阻止艾略特发表一篇东西,告诉他说那是垃圾。结果,艾略特还是发表了,只是附上一篇前言,注明“庞德这是垃圾”。

由此可见真正的知识人之间的关系,只有怀抱知识的尊严、对知识人有足够的尊重,我们才能表达出真正的自性,益人益己。

当代人中,我喜欢读余英时先生的序。虽然他的观点我未必都同意,但读其文字是多重的享受。看他给康正刚、顾颉刚、巫宁坤、史景迁、周有光、汪精卫等人的书所写的序文,可以看出他都花了工夫。康正果先生告诉我,余英时先生因为年高,故很少写文章,心有所想则借序文表达。这是借序文园地,浇自家块垒了。余英时先生的序几乎自成文体,是对他本人所学所思和作者文字的多重介绍。这样的风范,真是值得我们学习。

□余世存